

【回望经典】

文化矛盾会使资本成为野蛮力量吗？

——重读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童世骏

前几天在一个校友创办的文化小镇的图书馆墙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我阅读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或许可以为这句话作一个小小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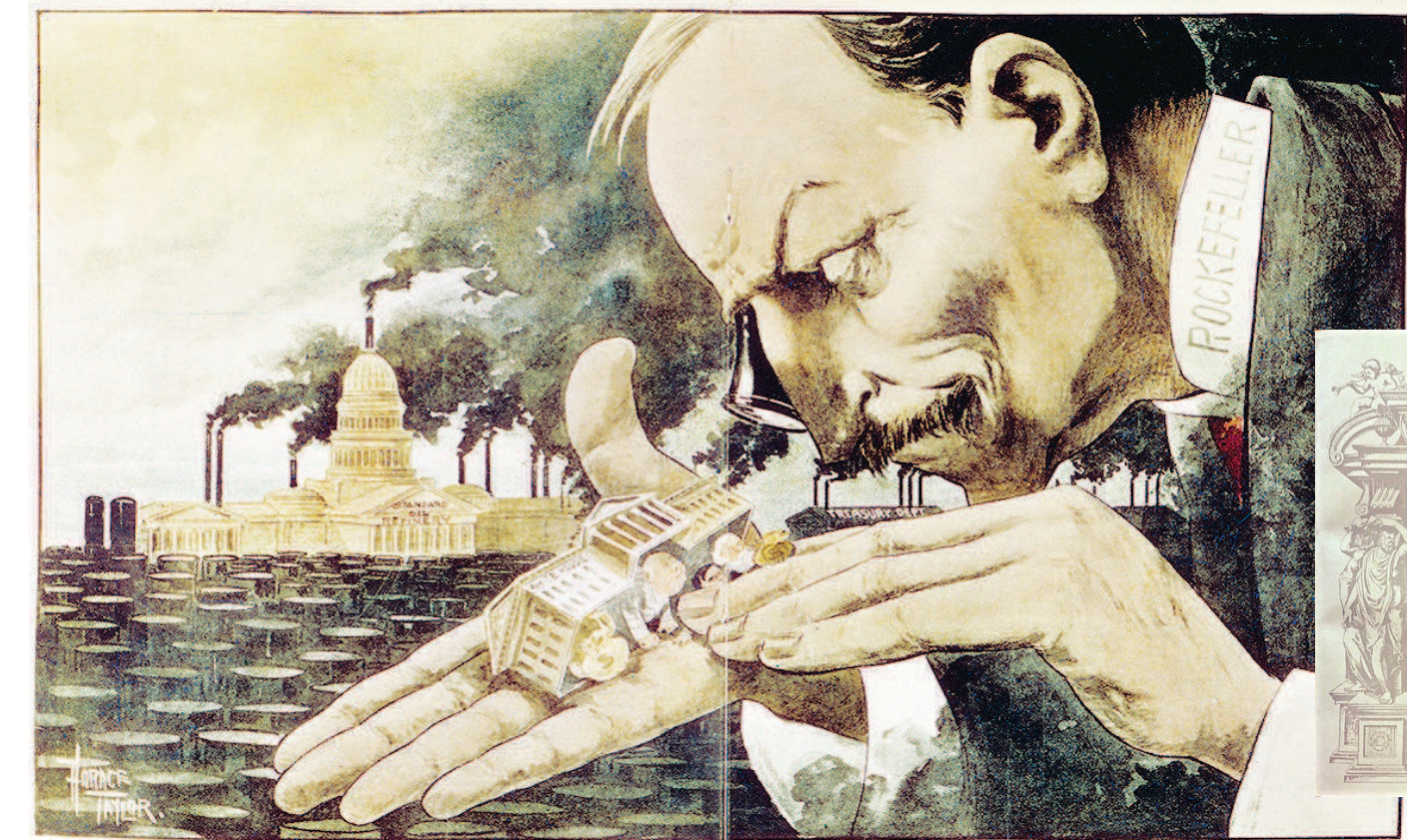
十年内两次阅读：
从哈贝马斯视角切入

丹尼尔·贝尔1919年5月出生于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家庭，先是办报、编刊和写书，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任教。贝尔曾在1987年发表过一篇题为“2013年的世界和美国”的文章；但可惜他于2011年1月去世，今年恰好是他去世十周年。

最初接触丹尼尔·贝尔，是32年前在挪威求学的时候。在一封写于1989年3月的信中，我在向同事介绍哈贝马斯的时候提到贝尔，说哈贝马斯虽然严厉批判德国的新保守主义，但对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还有些好感，“因为他认为贝尔等人的思想中至少保留了皮尔士、米德和杜威这些他自以为前辈的人的思想”。尽管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也非常有名，甚至更加有名，但哈贝马斯更重视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受哈贝马斯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贝尔的这本书，并认真做了笔记。那时离开我最初接触贝尔已经过了十年。大概在1999年年底，历史系王斯德老师约我为他主编的《历史教学问题》写稿，我就把“读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文呈交给他。今年二月去世的王斯德老师那时是人文学院院长，我是人文学院副院长；他在工作中和学术上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导、帮助和鼓励。

在那篇文章中，我介绍了尤根·哈贝马斯的观点，说他在比较以贝尔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时，对前者作了较高的评价。哈贝马斯认为，虽然总的说两国的新保守主义都只接受社会的现代性（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层行政），而反对文化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价值观

▲丹尼尔·贝尔
(1919-2011)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 丹尼尔·贝尔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讽刺漫画(1900)：银行家
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
(视觉中国)

念和现代艺术)，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是自由主义，而德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则是立宪主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出乎新保守主义者意料的那些现象（如激烈的社会批判、广泛的启蒙传统、反专制主义运动、在艺术和反文化领域的先锋派的重新崛起等等），美国新保守主义还试图在理论上寻找新的根据，而德国新保守主义则热衷于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具体的个人，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在从事一项有关新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个注释中也承认，哈贝马斯对于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矛盾”的分析批判，其“理论根据是正确的”，而最早注意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之间密切联系的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也曾邀请丹尼尔·贝尔这位哈佛同事与他一起开设有关

法兰克福学派的课程。普特南的书我曾经研读甚至翻译过，这或许也加强了我与贝尔之间的精神联系。

贝尔的问题意识：
资本主义的文化条件为
何矛盾重重

但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让我感兴趣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该书本身的话题：与社会的物质变化相伴随的文化变迁——或者说，可视为经济社会变迁之根源、背景 and 后果的文化现象，出现了哪些变化。贝尔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样重视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但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在此之外贝尔认为还有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贝尔认为，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解释通常所说的“企业

家精神”。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这两个方面从一开始就处在矛盾之中，但它们也因此相互制约着，阻止其中任何一方的过分膨胀。尤其重要的是，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那个精神起源即新教伦理，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因为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这三重因素，而受到严重威胁，其结果是社会凝聚力的消解、个人生活意义的失落、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破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我作为研究者的心态来说，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1999年7月发表的一篇报纸文章中，我讨论了“目前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三个文化矛盾”，即刺激消费的需要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倡创新精神

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追求“终极关怀”和避免巫术迷信之间的矛盾。在几个月后收入一个论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我借鉴贝尔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有的甚至还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科技专家，却成为各种邪教的忠实信徒”。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和“凡俗世界与理想境界”的讨论和思考中，都可以看到贝尔这本书影响的清晰痕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何具备合适的文化条件

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更有意思的一项工作，是把丹尼尔·贝尔有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讨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有关“单向度人”的讨论，以及让·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讨论结合起来，进而在当代语境中理解和发挥马克思在1858年手稿中有关“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

其内在限度”的讨论。借助于这些理论资源我想论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有不可缺少的文化根源，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背景，也同样有其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应对的文化后果；而恰恰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在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同时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的文化条件才可望具备；“资本”只有不成为“主义”，才不至于激化为资本之野蛮化趋势助纣为虐的那些文化矛盾。

今天的欧美学者们在谈到当代美国政治乱象乃至整个当代世界危机时，还会经常提到半个世纪之前的相关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来重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还需要更多篇幅来表达相关收获，故此打住。

（作者系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三种现实主义传统
在新时期的命运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不可谓不深，这是一个写作资源发生了整体转换的时代，先锋时期的写作充满了摹写的意味，模仿对象主要是西方战后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文学资源和立场得到了普遍的强调，文学与当代艺术同步为现代派立言，对1950-19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一次重大的扭转。

与此同时，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傅雷、朱生豪、李健吾等人的西欧文学翻译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的语境中，甚而带上了某种怀旧的意味。苏俄现实主义传统则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论的陨落而逐步淡出，只有源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现代风格而大为流行。回顾这段历史，这三种现实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这一关系也曲折地表现了几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结构关联。

文学资源的转换不是一件小事，将影响一代人的阅读与写作，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曾经在历史

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各种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今天已不再是文学生产的主要前提条件，那些曾经有过极大影响力的作品，如果不以“经典”的面目，很难回归当代的文化现场，但它们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更何况，如果不再能激发人的鲜活感受，“经典”的复现也可能空洞化。在这个层面上，作家的阅读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资源选择，反而成为了一条比较能说明问题的线索，比如在王安忆这里，她的阅读方法和经验就对应了上述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文化结构。

当代作家的抉择：
小说技术与现实关系

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始终面对两个基本问题，第一，

《遥想手工业时代——
王安忆谈外国文学》
王安忆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2021年4月)

现实主义心灵轨迹：王安忆读外国文学

■ 张屏瑾

如何用小说（技术）去书写现实，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借鉴当然会在这点上起到作用，但这个问题尚不足以完全造就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白话文学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社会与思想整体转型的重要产物，它在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当代文学主体性最基本的前提与组成。因此，作家们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以小说（技术）去表现这种问题意识，去解释历史与现实。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简而言之，不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有所解释的作家，很难成为会讲故事的作家。而外国文学在这点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除了写作方法、审美旨趣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面向。王安忆近些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稳定地体现出她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思考与追求，而在她对外国文学的阅读里，能够发现与这一追求相呼应的一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作家的阅读行为参与到当代文学之中所产生的深刻效应。

读法重点：总能
回归的现实主义的落脚点

若干年前，王安忆曾出版过一本《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在那本书里细读的多是中外名著，作为写作课的讲稿与教材，首先强调其内容的经典性和示范性。而新出版的这本《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记录了王安忆自1980年代以来

几近40年的阅读轨迹，视角相对而言更加个人化，讨论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更多样。有不少是通俗小说、侦探小说、以及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原作，也有《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经典小说，以及《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比较新的流行小说。总的来说，王安忆的阅读经验的价值体现在她的读法之上。首先，外国文学经典教育中不太得到强调的一个方面，即小说的大众接受，在王安忆的读法里显得比较重要，但这种接受并非在娱乐化的层面上，而是在小说对生活现实性的表达强度上，她在对侦探悬疑小说的解读中突出了这一点。

在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时，王安忆非常注重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以及环境与性格形成的关系。她的解读是再叙事和再创造式的，沿着原著本有的线索，不断添加、深化典型环境与人物的构成与意义，经常几乎是进一步重写了那些小说。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会逐渐发现，侦探小说的现实性，不仅是为了故事逻辑本身需要的严密与合理而存在，而且在这种严密与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艺术化。从缜密的现实逻辑中创造出超越性的艺术主题。“事情强行推到现实主义的世界”正是王安忆独树一帜的读法。

然而，对小说现实性的关注并非仅关乎“常识”，而是更加强调常人身上的不同寻常，被忽略掉的勇气以及内在的激情、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些不是只属于特定的人群，而是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紧紧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凶杀、失踪等特异与传奇事件本身表现的其实就是日常世界。王安忆总是能准确地指出作家在处理这些

传奇和现实的关系时遇到的问题、矛盾，实际上她自己的小说就常常带有悬疑气氛，凶杀、盗窃、失踪等社会事件与传闻曾给她带去过若干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传奇故事中读出反传奇的因素，再在反传奇的人生中关照永不磨灭的人的激情与能动性，这对于书写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共和国的创制与普通人的命运故事来说，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律令，而是回到了平民文学、革命文学的基本动机，把个体的性格能量汇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现代派文学资源可
否转化为现实主义？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现代派的文学资源？王安忆认为，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面貌，现代主义则是用更抽象化、概念化的方法“表现更为本质因而更为真实的时空状况”。这是最简略地抓住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但大致不错。她针对《百年孤独》的解读，就是用时间、空间和人物还原的方法，仔细梳理其中的实际脉络，提炼本质问题，并使之具体化、清晰化。这是一种独特的解读现代派文学的方法，不是将之再度神秘化，而是用看似笨拙的方法，打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指向与写作动机，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重新编码，并在现实性的意义上重新编码。更重要的是，试图从中找到与我们自身的现实能对应、以及不能对应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为现代派文学所做的某种“祛魅”工作，在我看来，如果这样的读法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

以来的现代派文学的读与写，或许就可以获得别一种展现了。

王安忆还很明显地关注物质问题，这也是一个带有总体性的问题。小说正是在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的时期，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的，物质的发达是小说广为传播的基础，与此同时，小说又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小说的精神动员功能对现代中国来说尤为关键。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总是以这种精神功能为前提，而越注重精神，也就越注重对精神的反面——物质的辨析，西方现代性在小说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在精神命题与物质社会发展的辨析、辩证中开展的。

王安忆由此特别关注劳动在现代历史中的突出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感。例如她对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的解读，既不在精神病理学层面上，也不落于抽象化的哲学命题，而是从手工业时代人类的劳动、和由此劳动所造就的过度敏感的感官入手，把小说主人公看成一个具有天赋异禀的工匠，“一个脱胎于热油之势的手工业时代的精英”。“一个轰轰烈烈的手工业时代里的英雄业绩”再次证明，劳动在这里不终结于庸常和凡俗，而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具体实干，指向了“精英”和“英雄业绩”，但这又是最为平凡的大多数人的精英与英雄。我们可以推测这背后蕴藏着对于历史动力的理解，普通人的谋生作业中体现出超常的能量，转化为传奇的故事推理。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